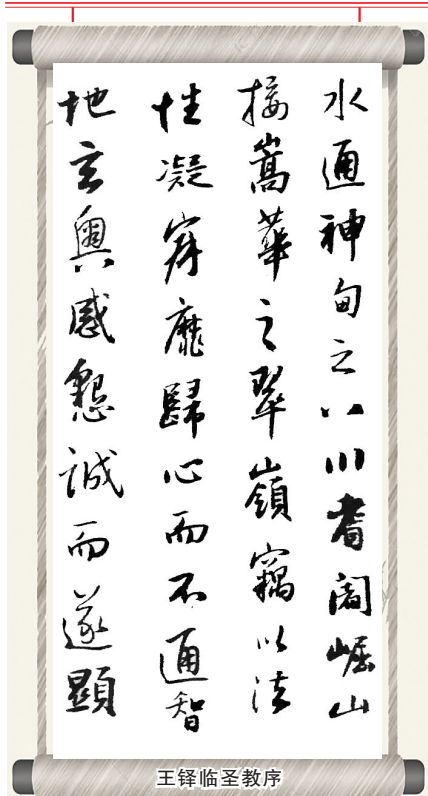


敬畏法帖 倾心临摹

□ 颀 林

作品赏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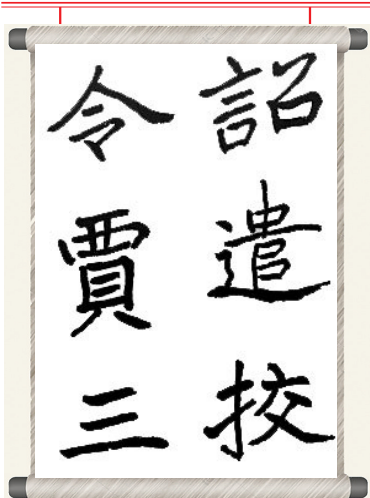


王铎临圣教序

我有幸于1985年考入欧阳中石先生创办的北京师范学院(今首都师大)第一届书法专业,在校期间代课老师大家林立,如沈鹏老师是草书课老师,隶书课是刘炳森先生,诗词课是林岫先生,美学课是叶秀山先生,据说叶秀山先生精通八国外语。较长授课或临时授课的有金开诚先生、高明先生、蓝玉崧先生、王遐举先生、祝嘉先生、瓦翁先生、熊炳明先生、张允和先生、魏启后先生、陈振濂先生等。陈振濂先生当年三十出头,英姿勃发,风度翩翩,在全国已享有大名,已经刮起“陈振濂旋风”,印象深刻。

欧阳中石先生则亲授楷书等课程,先生主张学书从楷书始,楷书从颜体入手,颜体则从《多宝塔》入手,认为此碑更加规范,饱满方正、整密匀称,法度森严、宽博厚重,相对于颜字的其它碑帖,更适于初学。欧阳中石提出:精准与无我,楷书为基础,临帖不宜多,临好一个字。意思是选好字帖后就要非常精准地把对象学过

作品赏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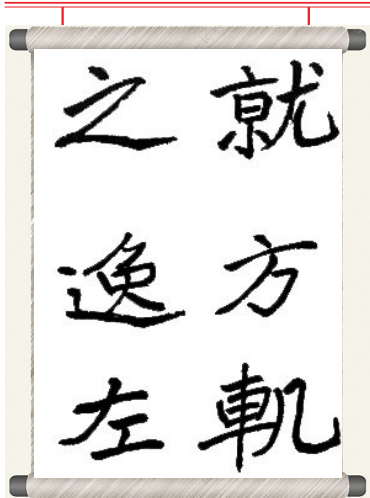


田树棻临石门铭

来,就是要惟妙惟肖地掌握到自己手里。其一,练就一双慧眼,其次“练”好你的手。看得既准,下笔就能精准,这样一来,你的书写能力就了不起了。临好一字十分不易,但只要你临好一个字,其余下来就容易多了。对所有造型艺术来说,这种训练会一生受用无穷。还有专家指出:对于所有造型艺术,形是一切,一切是形,形以外的神是不存在的。书法亦然。所以说临帖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力,是其境界江流的源泉。

历代的书法大家,无不精心于临摹之道,临摹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,攀登艺术高峰的必由之路。齐白石说:“临摹是学习传统技法的唯一方法。”历史上的褚遂良、颜真卿、欧阳询、冯承素、赵孟頫、米芾、祝允明、王铎、傅山、吴昌硕、李瑞清等都是临摹大师。明清之际的王铎,“一日临帖,一日应请索。以此相间,终生不易”。我们所见他的《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》,形神俱佳,蕴藉高雅,老笔纷披,当时王铎只有34岁,令人惊叹!距现今流传的王铎书作看,40岁之前的临书作品《圣教序》几乎占了半数,用了大半生的心力。王铎反复临摹张芝神品《冠军帖》,形式有立轴、长卷、扇面等,足见他对《冠军帖》的追慕和浸透之深。在《王铎墓志铭》中描述道:“趣举一字,矢口立应”,“如灯取影,不失毫发”,这是何等精熟的程度!背临法帖,矢口立应,用笔造型都到位,不失毫发,形神俱得。这种临摹功力历史上都鲜有敌手。现代草书大家林散之认为王铎为“自唐怀素后第一

作品赏析



人”,日本有“后王胜前王”之誉。

现代书法大家如沈尹默、吴玉如、白蕉等也是临帖大师,白蕉先生说:“临写是一个书家终生不懈的学习手段。”他临的《兴福寺残碑》被誉为“临帖之极境”。林散之、胡小石、启功、欧阳中石等先生晚年还在做临摹的功课。近来拜读了田树棻先生的《临石门铭》,飘逸自然,神完气足,可谓是百年一遇,一代大家就在眼前。

近年来书法界既鱼龙混杂,又百花齐放,出现了所谓的“xx书”。这种书法探索和实验并不成功,离形成流派尚有很大的距离,不像日本当年的“少字数”“墨象派”那样成功。

书法这门艺术,你离传统愈近,心里就愈发踏实,愈容易收益,愈容易成功,否则将于真正的书法艺术渐行渐远,漫无边际,或许会跑到另外一个领域了。美学大家刘再复先生讲:艺术有其不可重复性和再现性。书法亦然。比如王羲之确实如此,他的博大精深今人远不能及。如果你要说超过王羲之,那是你对他了解得肤浅。作为我来说,不摇摆,更不跟风,不折腾,只能是脚踏实地临帖学书,逐步升华自我。要牢记欧阳先生的教诲,“努力取法贤者,不断否定自我”。

山西省书画院从2003年开始举办临摹展,至今二十年共举办临摹展二十届,成效好,影响大,为山西文化艺术界的品牌之一,功莫大焉!

学习书法,从临摹开始,临摹之道是我们学书法的终身功课,让我们心无旁骛地继续临帖吧!

作品赏析



王铎临王献之贴

明代汾阳籍进士朱之俊撰文石刻新发现 弥补三大遗憾

□ 李勇斌

近日,笔者在汾阳某地(为避免丢失,石碑地址暂不透露)发现一块石碑,该碑由明代汾阳籍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讲朱之俊撰文,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发现该碑可以弥补三大遗憾。

弥补遗憾一 解决石刻所在地庙宇创建年代不详之憾

2011年出版的《吕梁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汾阳卷》记载:石刻所在庙宇创建年代不详。

该碑长1.77米,宽0.86米,厚0.21米,石质为花岗岩之斑岩,碑阳保存基本完

好,明崇祯三年(1630年)所立,距今已有392年,题为《创建关帝庙记》,主要记述了汾阳某地新建关帝庙的由来以及过程,从碑文可知,该庙建于天启四年(1624年),

断断续续直至崇祯三年(1630年)完工,历时6年。碑阴文字缺失严重,估计应为捐资名录等相关信息。该石刻的发现完美地解决了创建年代不详之遗憾。

弥补遗憾二 补充了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碑版文集》缺少该文之憾

民国二十四年汾阳知事王培昌曾搜集朱之俊所遗碑记等编印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碑版文集》一书,内收录有由朱之俊撰文的《重修三圣庙缘起》《新修金龙四大天王庙记》《新建城隍庙乐楼记》《新建福慧庵记》《西顶新建玄天上帝庙记》等文20余篇,经比对,该石碑文章并未收录于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碑版文

集》一书中。该石刻的发现补充了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碑版文集》文章缺少该文之遗憾。



弥补遗憾三 补充了《三晋石刻大全汾阳卷》缺少该石刻之憾

查询《三晋石刻大全汾阳卷》尚未收录此碑,该石碑的发现可补充《三晋石刻大全汾阳卷》缺少该石刻之憾。目前,汾阳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已于近日对该石碑进行了拓片,以便再版时收录。朱之俊(1596年—1671年),字擢秀,号沧起,汾阳大向善村人。明天启二年中

进士,入翰林院供职,不久迁国子监司业。明崇祯元年,充会试分校,后转翰林院侍讲。崇祯四年,被罢官归里。清顺治二年夏四月,起用为秘书院侍讲,兼修国史副总裁,八月受命顺天乡试后,于十月辞官,再次回到故里。朱之俊一生著作颇丰,现有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砚庐诗

草》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排青楼诗草》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峪园诗草》《朱沧起先生诗文集 归田尺牍》存世。

后记:该碑不远处散落有双龙额首和底座,或许是该石碑的配套之物,现如今,朱之俊撰文石刻留存的并不多见,希望该石碑能早日竖起保护。



正对石刻进行拓片。汾阳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相关人员李勇斌摄